

# 魏晉南北朝《詩經》接受論 ——以普通讀者為中心

林耀潑\*

## 摘 要

魏晉南北朝的《詩經》接受史，由以普通讀者為主體的效果史、以經學家與詩評家為主體的闡釋史及以詩人作家為主體的影響史三者所構成。本文主要以普通讀者為中心展開論述。魏晉南北朝普通讀者的《詩經》接受，主要表現在《世說新語》一書中。魏晉南北朝普通讀者的《詩經》接受也受當時戲謔風氣的影響，有模擬嘲諷，有言語機鋒。他們也喜歡討論《毛詩》何句最佳，這種摘句鑒賞可視作摘句批評的萌芽與雛型。自況身世、品評人物也是《詩經》接受常見之事。謝玄引「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鑒賞，形成縣長一千多年的「情景」觀念接受史及「鄭家《詩》婢」所引起的波瀾，可以說是普通讀者中的異數，他們正是讓約翰生博士感到高興的那一類普通讀者。廣大的「普通讀者群體」是文學史不能忽略的一群，他們的意見值得寫進「讀者文學史」。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詩經》接受史、普通讀者、《世說新語》、摘句鑒賞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A Study of the Reception of *Shih Ching* (*Classic of Poetry*) by General Readers during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Lin Yao-Lin \*

## Abstract

The reception history of *Shih Ching* (*Classic of Poetry*) for the period of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nvolves the history of poetic perception by general readers, of poetic interpretations by classical poetry scholars and critics, and of the personal influences of the poets.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reception of *Shih 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eneral reading public, which is mostly manifested in *Shih-shuo hsin-yü* or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Amidst a contemporary account of social history, general readers of *Shih Ching* in the period of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were often both mocking and witty. They also liked to discuss their choice of the best lines from *Mao Shih* (one of the four schools of *Shih Ching*), which marked the start of the tradition of quotation criticism. It was common for such readers to compare their life experiences or to evaluate others by the process of reader response and the appreciation of quotes.

One outstanding example, the passage “The willows waved to the breeze when I left for war, and now the snow is falling when I have returned,” quoted by Xye Xuan, has formed the basis of a reception history for the concept of “scene” for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Another instance is the great influence of “*Zhen Poetry Maid*.” Such readers represented a type who Dr. Johnson would have taken great interest in. “An immense general readership”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literary history. Reader responses deserve to be written into “the history of reader literature.”

**Key words:**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Reception History of *Shih Ching*, General Readers, *Shih-shuo hsin-yü*, Quote Appreciation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魏晉南北朝《詩經》接受論 ——以普通讀者為中心

林耀潏

## 一、前言

幾乎所有的學術史、經學史、《詩經》學史都說，魏晉南北朝是經學衰落的時代，作為經學史一部分的《詩經》學史，魏晉南北朝的《詩經》學也是衰落的。

鄭士元《中國學術思想史》以為，經說經注累數十萬言、玄言倡盛、佛理輸入、文學興盛，這些因素造成「經學之衰落」。<sup>1</sup>

皮錫瑞《經學歷史》說：

經學盛於漢；漢亡而經學衰。桓、靈之間，黨禍兩見；志士仁人，多填牢戶，文人學士，亦扞文網，固已士氣頹喪而儒風寂寥矣。<sup>2</sup>

皮錫瑞又說：

魏、晉人所注經，準以漢人著述體例，大有逕庭，不止商、周之判。蓋一壞於三國之分鼎，再壞於五胡之亂華，雖緒論略傳，而宗風已墜矣。<sup>3</sup>

魏晉經學之衰，其原因在黨錮之禍、文網之密以及連年戰爭之所致。

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說：

江左疆理殊隘，規模不宏，人尚清談，家藏釋典，故《宋書》、《南齊書》，儒林無傳，《梁》、《陳》二書有之，其源流授受，亦莫若《魏書》、《北齊書》詳也。……。  
《南史·儒林傳·序》云：「自中原橫潰，衣冠道盡，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

<sup>1</sup> 鄭士元：《中國學術思想史》（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288。

<sup>2</sup> 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頁141。

<sup>3</sup> 同前註，頁164。

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眾，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大道之鬱也久矣乎！……。及陳武創業，時經喪亂，衣冠殄瘁，寇賊未寧，敦獎之方，所未遑也。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sup>4</sup>

馬宗霍上引《南史·儒林傳·序》文字可見南朝經學之沒落，《南史·儒林傳·序》尚有「魏正始以後，更尚玄虛，公卿士庶，罕通經業。」之語。<sup>5</sup>清談盛行、佛教普遍、疆域狹隘、戰亂頻仍，這些都導致經學的衰落。

馬宗霍《中國經學史》又說：

蓋漢人治經，以本經為主，所為傳注，皆以解經。至魏晉以來，則多以經注為主，其所申駁，皆以明注，即有自為家者，或集前人之注，少所折衷，或隱前人之注，跡同攘善，其不依舊注者，則又立意與前人為異者也。至南北朝，其所執者更不能出漢魏晉諸家之外，但守一家之注而詮釋之，或旁引諸說而證明之，名為經學，實為注學。於是傳注之體日微，義疏之體日起矣。<sup>6</sup>

漢人治經以「本經」為主，所為傳注，皆以解經。魏晉南北朝人則多以「經注」為主，其所申駁，皆以明注。「名為經學，實為注學。」此馬宗霍之論斷。本田成之以為，「這等之說大部分在今《毛詩正義》裏被引用，但沒有特別可取的處所」<sup>7</sup>。魏晉南北朝受談玄、佛學之影響，義疏之體日起，而傳注之體日微，所謂的「經注」、「注學」，少所折衷、跡同攘善，此馬氏、本田氏之所譏也。

魏晉南北朝經學中衰的原因，李威熊歸納為五項：經學過度發展的反響、漢末黨錮之禍的刺激、由於當時政局不穩定、玄談風尚的直接影響、唯美文風的負面作用。<sup>8</sup>林葉連歸納為六項：經學極盛而衰之必然規律、漢末黨錮之禍打擊學術界、曹魏重法輕儒之風、政局混亂與恐怖、清談與玄學盛行、唯美文風之負面作用。<sup>9</sup>林葉連之說多「曹魏重法輕儒之風」一項，其餘大同小異。上引諸家之說多少也談到魏晉南北朝經學中衰的種種原因。

夏傳才說：「魏晉南北朝《詩經》學的發展，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魏晉時代的鄭學王學之爭，爭論的中心是如何對待古文經學的家法問題；第二階段是南北朝時

<sup>4</sup> 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頁73-74。

<sup>5</sup> [唐]李延壽：《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頁468。

<sup>6</sup> 同註4，頁85。

<sup>7</sup> [日本]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臺北：廣文書局，1979年），頁198。

<sup>8</sup> 李威熊：《中國經學發展史論（上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頁201-204。

<sup>9</sup> 林葉連：《中國歷代詩經學》（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93年），頁145-151。

代的南學北學之爭，鬥爭的中心是鄭學是否還要繼續發展的問題。」夏傳才又說：「這兩個階段所以沒有取得重大成就，是和整個經學的衰落有密切關係。」<sup>10</sup>

魏晉南北朝儒學衰落，眾口一聲，已成定論，但林登順有不同的看法，他說：

皮錫瑞《經學歷史》一書中，把魏晉視為經學中衰期，南北朝視為經學分裂期後，往後學子一提到這時期的學術文化宗教思想的發展，首要因素，一定都歸諸於儒學的衰落。儒學似已成為此時期之過街老鼠，但事實情況果真如此？……誠如馬宗霍《中國經學史·魏晉之經學》所言：「持較兩漢，得失誠未易評，然其自成為魏晉之學，則可斷言，蓋亦經學之一大變也。」似乎較為中肯。<sup>11</sup>

一代有一代的儒學，一代有一代的經學，一代有一代的《詩經》學，在經學領域中，魏晉南北朝的《詩經》學似乎並不足觀，但在文學及文學批評領域中，在這「文學的自覺時代」中，《詩經》學卻另有一番風貌。<sup>12</sup>

## 二、魏晉南北朝《詩經》接受史簡述

魏晉南北朝是文學的自覺時代，對《詩經》的有關探討也大量地集中在文學的範疇。張啟成〈論魏晉南北朝詩學觀的新突破〉一文認為，這種新詩學觀的主要特徵是，它突破了把《詩經》作為經學的束縛，主要表現在：注重學習《詩經》的寫作技巧、比興手法、修辭手法與語言之美；從詩言志到詩緣情的轉化；對《詩經》部分詩旨的新探索；論《詩經》對後世文學與文體的影響。<sup>13</sup>鄒然〈六朝《詩》說攬勝〉一文認為，《詩經》批評發展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逐漸呈現出不同以往的新趨勢，批評者文學鑑賞和藝術審美的自覺意識得到加強，涉及更為廣泛，探討角度更為開闊，出現了摘句激賞、文體比較、手法甄別、源流探索等新的批評現象，形成一些著名範疇和命題，這在《詩經》文化史上具有較大意義，開闢了從文學角度研討《三百篇》的新途徑。鄒然此文探討了「緣情綺靡」說、「兩字窮形」說、毛詩激賞例、詩賦比較例、「為情造文」說、「事類為佐」

<sup>10</sup> 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增注本）》（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75-77。

<sup>11</sup> 林登順：《魏晉南北朝儒學流變之省察》（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頁420-421。

<sup>12</sup> 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提到：「他（曹丕）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于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來看，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見《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501-529。此論一出，影響深遠，且推而廣之，判定「六朝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有關論述，可參黃偉倫：《魏晉文學自覺論題新探》（臺北：台灣學生書局，2006年），頁463-470。

<sup>13</sup> 張啟成：〈論魏晉南北朝詩學觀的新突破〉，《貴州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頁63-69。

說、「比顯興隱」說、「賦體意浮」說、國風潤陳思、小雅澤阮籍。<sup>14</sup>魏晉南北朝經學受玄理、佛理的影響很大，就《詩經》學而言，則向文學鑑賞、文學創作及文學批評理論傾斜。

本文將援引德國文學理論家姚斯的接受理論切入魏晉南北朝的《詩經》研究。姚斯試圖建立一種轉向讀者的文學史。他說：

一部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如果沒有接受者的積極參與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只有通過讀者的傳遞過程，作品才進入一種連續性變化的經驗視野。在閱讀過程中，永遠不停地發生著從簡單接受到批評性的理解，從被動接受到主動接受，從認識審美標準到超越以往的新的生產的轉換。<sup>15</sup>

姚斯又說：

第一個讀者的理解將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鏈上被充實和豐富，一部作品的歷史意義就是在這過程中得以確定，它的審美價值也是在這過程中得以證實。<sup>16</sup>

姚斯又說：

一部文學作品，並不是一個自身獨立、向每一個時代的每一讀者均提供同樣的觀點的客體。它不是一尊紀念碑，形而上學地展示其超時代的本質。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樂譜，在其演奏中不斷獲得讀者新的反響，使文本從詞的物質形態中解放出來，成為一種當代的存在。<sup>17</sup>

接受美學認為，藝術家的創作物只能叫做「文本」(text)，必須經由讀者的參與創造，才能叫做「作品」(work)，「讀者是上帝」是接受美學的信條。而讀者的品類為何？「簡單接受」、「被動接受」的是「普通讀者」，「批評性的理解」、「主動接受」、「認識的審美標準」的是「理想讀者」(批評家)，能「超越以往的新的生產的轉換」是接受影響的「作家」(是作家同時也是讀者)。「讀者群體」包涵普通讀者、批評家及作家。

以姚斯的理論為基礎，陳文忠把接受史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效果史」，陳文忠

<sup>14</sup> 鄒然：〈六朝《詩》說攬勝〉，《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3卷第1期（2000年2月），頁41-47。

<sup>15</sup> 〔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著、周寧、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4。

<sup>16</sup> 同前註，頁25。

<sup>17</sup> 同前註，頁26。

說：

文學的歷史不只是作家作品排列成的事件史，更主要的是作品所產生的效果史。沒有讀者的接受和持續的審美效果，作品就在實際上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因此，效果史的研究實質上是考察藝術作品實際存在的歷史形態，是認識作品怎樣存在和為什麼這樣存在。<sup>18</sup>

第二部分是「闡釋史」，陳文忠說：

闡釋史以詩評家為主體，是歷代詩評家對作品的創作根源、詩旨內涵、風格特徵、審美意義等進行分析闡釋所形成的歷史。<sup>19</sup>

第三部分是「影響史」，陳文忠說：

當一篇作品對後代作家產生了創作影響，被歷代同題同類之作反復摹仿、借鑒、翻用，就形成了它的影響史。換言之，所謂影響史，就是受到藝術原型和藝術母題的影響啟發、形成文學系列的歷代作品史。<sup>20</sup>

「效果史」以普通讀者為主體，著重純審美的閱讀欣賞；「闡釋史」以詩評家為主體，著重理性的分析；「影響史」以詩人創作者為主體，著重創作者的接受影響和摹仿、借用、化用。普通讀者有最龐大的數量，要完成任何一部「普通讀者文學史」是絕對做不到的，他們遍佈各地，也很少留下閱讀、審美經驗的痕跡。以理想讀者（評論家）為主體的闡釋史最被重視，也是絕大部分文學批評史關注的。哈羅德·布魯姆說：「一部詩的歷史就是詩人中的強者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間而相互誤讀對方的詩的歷史。」<sup>21</sup>簡言之，一部詩的歷史就是強者詩人的影響史。效果史、闡釋史、影響史三者組成完整的接受史。

魏晉南北朝的《詩經》接受史就是由上述三部分組成的。以普通讀者為主體的魏晉南北朝《詩經》效果史，資料散在各處，史傳、詩話、文集、碑刻、類書都有它的一鱗半爪，蛛絲馬跡，然而最集中、最豐富的要推志人著述《世說新語》一書，本文將以此為中心論述之，詳下節。本文之所以以《世說新語》為探討重心，以其「普通讀者」量較為集中之故，而不是除《世說新語》之外，魏晉南北朝即無其他「普通讀者」。據本文（表二）所列，《世說新語》運用《詩經》的情況，效果史計二十九次、影響史計十四次、

<sup>18</sup> 陳文忠：《文學美學與接受史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294。

<sup>19</sup> 同前註，頁297。

<sup>20</sup> 同前註，頁301。

<sup>21</sup> [美]哈羅德·布魯姆、徐文博譯：《影響的焦慮》（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5。

闡釋史計一次，以「普通讀者」為主體的效果史佔百分之六十五點九。

魏晉南北朝的《詩經》闡釋史，以經學家（如王肅、王基、孫毓、陳統、郭璞等）<sup>22</sup>、文學批評家（如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為主。經學家的著作絕大多數亡佚，孔穎達《毛詩正義》保存了一些，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也輯了一些殘本，這顯示了「《詩經》經學」之衰落，經不起時間巨人的考驗。《文心雕龍》、《詩品》則提出了不少圍繞《詩經》的理論命題，這顯示此時期「《詩經》文學」之昌盛。

魏晉南北朝的《詩經》影響史，是此時期《詩經》接受史最值得關注的領域。曹操的〈短歌行〉直接用《詩經》的句子，「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出自《鄭風·子衿》，「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出自《小雅·鹿鳴》。嵇康的〈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也用了「陟彼高岡，言刈其楚」、「言念君子，不遐有害」的《詩經》句子。其他借鑒、化用的例子，俯拾即是。葛洪《抱朴子·鈞世》說：「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世說新語·文學》云：「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風詩》。」束皙亦作有《補亡詩》六首。蕭華榮有〈補《詩》〉、刪《詩》、評《詩》——《詩經》接受史上的三個「異端」一文，登《華東師大學報》1988年6期，此文陳文忠說「這是筆者迄今目遇國內學者最先以『接受史』為標題的論文之一。」<sup>23</sup>把補亡詩視作《詩經》接受史上的三個「異端」之一，可見它的革命性和開創性。

魏晉南北朝的《詩經》接受史，經學的一面偏枯，重視個人主體的審美感受，借鑒《詩經》感時感物的創作方式，化用《詩經》的意境，討論圍繞著《詩經》而來的詩學範疇與命題，是這個時期「文學的自覺」的一部份。魏晉南北朝之《詩經》學，「自成為魏晉之學，亦經學之一大變也。」此大變含有濃濃的文學因素。

### 三、《世說新語》中普通讀者的《詩經》接受

魏晉南北朝《詩經》效果史的研究，以普通讀者為主體。我們要問，什麼是普通讀者？最簡單的辨別是，詩評家、經學家、詩人不是普通讀者，他們的著作和創作，屬於闡釋史和影響史的研究範圍。具體地說，經學家的生平及著作在各史〈儒林傳〉中呈現，詩人的生平及著作在各史的〈文學傳〉、〈文苑傳〉中呈現，有些經學家、詩評家、詩人的生平及著作則可在他們的本傳中呈現。此外，列入鍾嶸《詩品》中的詩人，當然不是普通讀者。辨別誰是不是普通讀者，基本上可採用上述這種「排除法」。又，普通讀者的

<sup>22</sup> 據劉毓慶《歷代詩經著述考（先秦——元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所著錄，魏晉南北朝可考的《詩經》學著作有111種，其中解《毛詩》的著作占109種，只有兩種是解《韓詩》的。見頁65-111。

<sup>23</sup> 同註18，頁403。

身分多元，上自皇帝公卿，下至輿臺皂隸，不因為顯貴如帝王后妃公卿，就自動「升等」為「非普通讀者」，也不因為奴婢身分而不將之列入。

(表一) 魏晉南北朝各史〈儒林傳〉、〈文學傳〉一覽表

史書名稱	儒林傳	文學傳（或文苑傳）
三國志	無	無
晉書	有	有〈文苑傳〉
宋書	無	無
南齊書	無	有〈文學傳〉
梁書	有	有〈文學傳〉
陳書	有	有〈文學傳〉
魏書	有	有〈文苑傳〉
周書	有	有〈藝術傳〉
北齊書	有	有〈文苑傳〉
南史	有	有〈文學傳〉
北史	有	有〈文苑傳〉

就現存魏晉南北朝的各種文獻中，以《世說新語》保存最多普通讀者的《詩經》接受資料，本節即以此為中心論述之。

維吉妮亞·吳爾夫 (Virginia Woolf, 1882-1941) 在《普通讀者》一書中說：

很值得把約翰生博士〈格雷評傳〉(Life of Gray) 裡的一句話特別抄寫出來：「能與普通讀者的意見不謀而合，在我是高興的事；因為，在評定詩歌榮譽的權利時，在高雅的敏感和學術之後，最終說來應該根據那未受文學偏見污損的普通讀者的常識。」這句話定義了普通讀者的性質，賦予他們的讀書目的以一種神聖意味，並且使得這麼一種既要消耗大量時光，又往往看不出實效的活動，由於這位大人物的讚許而受到認可。約翰生博士心目中的普通讀者，不同於批評家和學者。他沒有那麼高的教育程度，造物主也沒有賞給他那麼大的才能。他讀書，是為了自己高興，而不是為了向別人傳授知識，也不是為了糾正別人的看法。<sup>24</sup>

約翰生博士 (Samuel Johnson, 1709-1784) 是英國十八世紀的學者、作家，他的著作屬於闡釋史、影響史研究的領域，但他也重視普通讀者的意見，認為他們也有「評定詩歌

<sup>24</sup> [英] 維吉妮亞·吳爾夫著、劉炳善、石雲龍等譯：《普通讀者》(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頁1。

榮譽的權利」。維吉妮亞·吳爾夫是英國現代作家，以小說、評論、散文蜚聲文學界，她認為，普通讀者的讀書目的有一種「神聖意味」，「為了自己高興」。在《世說新語》中，有一些普通讀者也是如此接受《詩經》的。

有關「普通讀者沒有那麼高的教育程度」一語，用在魏晉南北朝的普通讀者身上，未必允當，因為他們也許稱不上是批評家或作家，但未必只是略識之無之輩，他們有的是權貴，有的是官吏，只是人生事業不在文學、學術上而已。如果我們把它修正為：「普通讀者是一群教育程度各異，不以文學、學術、藝術為人生主要事業的讀者」就能符合魏晉南北朝的實際情況。

范子燁說：「六朝時代是詩歌藝術敷榮耀彩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詩歌對其它形式的語言藝術都有不同程度的滲透。基於這樣的文化背景，《世說新語》作為敘事文學亦形成了詩一般的語言美。出色的用典技巧是這部古典名著創造這種美的關鍵。」<sup>25</sup> 劉勰《文心雕龍·事類篇》說：「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事類即是用典。據范子燁的初步統計，《世說新語》涉及西漢以前的典籍共有 36 種，用典總次數為 325 次，其中引用《詩經》40 次。<sup>26</sup> 筆者根據《世說新語》重要箋疏及期刊論文勾稽，得 44 次（《世說新語》運用《詩經》一覽表，請見表二），若依王逸《楚辭章句》例，凡《楚辭》中稍涉《詩經》字眼及《詩經》意境者，都算《騷》文引《詩經》立義的話，次數會再增加。<sup>27</sup> 蕭希鳳〈論《世說新語》對《詩經》的引用〉一文，討論大量引用《詩經》的原因、用典方式及引用《詩經》的作用。<sup>28</sup> 張立兵〈《詩》「經」的解構與文學的張揚——試論《世說新語》引《詩》的特點及其產生原因〉一文認為，其主要特點為：引《詩》用於戲謔等不莊重的場合，《詩經》的地位由漢儒宗為聖典而淪為日常談笑之資；引《詩》形式漸趨豐富，用《詩》注重化用《詩》的意境，表現出對《詩》的審美鑑賞意識等，使《詩》的文學性得以凸顯，這反映出魏晉時期對《詩經》經典尊崇的消解和文學闡釋的張揚，其發生與《詩》的文學闡釋自先秦以來的不斷發展，以及魏晉時期經學中衰，儒、道、釋思想並立，人的主體精神的自覺與文學的自覺等有深層的聯繫。<sup>29</sup> 范氏、蕭氏、張氏從各個側面探討到《世說新語》引用《詩經》的種種，包涵用典特徵、

<sup>25</sup> 范子燁：〈「小說書袋子」：《世說新語》的用典藝術〉，《求是學刊》（1998 年第 5 期），頁 87-91。

<sup>26</sup> 同前註，頁 87。

<sup>27</sup> 魯瑞菁有〈王逸《楚辭章句》引《詩》考論〉一文，詳細論證王逸《楚辭章句》，稽之於《詩》，以見《騷》字詞大旨之趣及《騷》文依託《詩》以立句旨之義，魯氏計得 107 條，並新增當引未引《詩》作字詞訓詁 6 條，當引未引《詩》作句旨互通 2 條。若依王逸及魯瑞菁例，《世說新語》引《詩經》的次數，當不止 44 次。魯瑞菁此文發表於「第二屆全國經學學術研討會」（高雄市：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主辦，2008 年 11 月 15 日）。

<sup>28</sup> 蕭希鳳〈論《世說新語》對《詩經》的引用〉，《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第 29 卷第 5 期（2008 年 5 月），頁 29-31。

<sup>29</sup> 張立兵：〈《詩》「經」的解構與文學的張揚——試論《世說新語》引《詩》的特點及其產生原因〉，《社會科學家》總第 124 期（2007 年 3 月），頁 19-22。

方式、場合、作用、審美鑑賞意識，並與魏晉時期的社會文化現象作聯結，各具勝義。

本文以普通讀者的效果史為切入點，論述他們的《詩經》接受，涉及到闡釋史及影響史的部分，則不討論。所論述的效果史例子，若其意較為顯明，則在（表二）說明，不在正文中討論。

岡村繁在《〈世說新語〉所見詞語用典考》中說：「《世說》所見口語中用及的典故果真是書中人物自己說的嗎？抑或是劉義慶乃至他所據諸史籍的作者之文飾結果？況且，一一考究弄清當時原話真相恐怕已屬不可能。」<sup>30</sup>《世說新語》是紀錄漢末魏晉名士之口語和逸事的故事集，可謂最為集中地保存了當時語言的面貌，有一定的認識價值，至於上述的疑竇，本文和岡村繁一樣，不涉及這些疑竇的考證，完全依從《世說》之文進行考察。

《世說新語·言語 1》云：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忤色；先生何為顛倒衣裳？」  
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說：「《詩·齊風·東方未明》：『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藉以嘲邊之舉止失措。」<sup>31</sup>袁奉高引《詩·齊風·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句，嘲邊文禮見己之舉止失措，邊文禮就奉高所說「昔堯聘許由，面無忤色」，反唇相譏，以為奉高初臨，德不如堯，以是顛倒衣裳。這兩位普通讀者的言語交鋒均引「顛倒衣裳」詩句，而作對自己有利的運用。

《世說新語·言語 49》云：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第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出自《詩經·魯頌·泮水》，意思是大官小官，都跟隨僖公出行。孫盛帶著他的兩個兒子跟隨庾公（亮）出獵，所以孫盛次子齊莊信手拈來《詩經》語句回答庾公，二者情景相同，答得自然貼切。<sup>32</sup>孫齊莊一個八歲小兒能選取適當詞句，隨機應答，這個普通讀者顯然是熟悉《詩經》詩句的。孫盛曾任著作郎，著有《魏氏春秋》、《晉陽秋》，匿名審查委員認為：「其雖非經解家或評論家，唯於文學自有一定之素養與見地，謂為『普通』，總覺不妥。建議作者可採 Eco 經驗讀者(empirical reader)及典

<sup>30</sup> [日] 岡村繁著、陸曉光譯：《魏晉六朝の思想和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440-442。

<sup>31</sup>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上冊）修訂本》（臺北：正文書局，2000年），頁48。

<sup>32</sup> 同註28，頁29。

型讀者(Model Reader)的分別，較為合理清楚。」此意見甚好，稱史家為「普通讀者」，確有不妥。然此則所述乃孫盛之子孫齊莊七八歲時的《詩經》接受，非孫盛本人之《詩經》接受，將八歲小兒孫齊莊視為「普通讀者」，應無不妥。

《世說新語·言語 56》云：

簡文作撫軍時，曾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兩人似乎都謙恭儒雅，一團和氣。但其實此前司馬昱曾起用殷浩以抗桓溫，而桓溫對他也是有所忌憚，兩人暗地裡的較量一直存在，而這次入朝賦《詩》，桓溫則處於下風。桓溫賦《詩》「伯也執殳，為王前驅」用《衛風·伯兮》語，自比為執殳前驅者，雖為謙詞，但將任撫軍大將軍的司馬昱比作「王」，雖在天子衰微的東晉，亦屬僭越；而司馬昱「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出自《魯頌·泮水》。意取《鄭箋》「臣無尊卑，皆從君行而來。稱言此者，僖公賢君，人樂見之」，<sup>33</sup>是將話題一轉，說我們入朝都是「樂見」皇帝，不分尊卑，誰先行都一樣。簡文帝司馬昱本來頗有才幹，但桓溫擅權專橫，他也只好採取避讓和妥協的態度，讓桓溫先行，但魏晉人好以一言而定人物優劣，他可以說通過賦《詩》挽回了顏面。<sup>34</sup> 未來的東晉簡文帝司馬昱和權臣桓溫的言語交鋒，是透過引用《詩》句呈現的，在此則中，我們看到普通讀者的身分可以是權貴。

《世說新語·言語 80》云：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北門〉乃《詩經·邶風》之詩篇，《毛詩序》：「〈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潛夫論·交際》說：「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李弘度對〈北門〉之接受，與上述二說相同，這位普通讀者引〈北門〉之詩，從殷浩那裡找到了一個縣令的差事。

《世說新語·言語 94》云：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苻堅所禽，用為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己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淳酪養性，人無嫉心。」

<sup>33</sup> 孔穎達：《毛詩正義》（臺北：臺灣古籍出版公司，2001年），頁1643。

<sup>34</sup> 同註29，頁20。

劉孝標本注引張資《涼州記》略云，張天錫自立為涼州牧，後歸附苻堅，堅軍敗，遂南歸。張天錫本為北人，南歸事二主，頗有嫉己者嘲弄之，問「北方何物可貴？」亦即問北方人張某身事二主，寧不差乎？張天錫所答前二句化用《詩經·魯頌·泂水》「翩彼飛鴉，集于泂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詩句，原詩以飛鴉比淮夷，言淮夷歸附魯僖公。孔穎達《毛詩正義》云：「翩然而飛者，彼飛鴉惡聲之鳥，今來集止於我泂水之林，食我泂宮之桑黹，歸我好善之美音。惡聲之鳥，食桑黹而變音，喻不善之人，感恩惠而從化。」<sup>35</sup> 此處張天錫以鴉鴉自比，謂己已被孝武所感化，不善之人可被感化，此北方之所貴也。

《世說新語·文學3》云：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箋疏此則頗詳，茲全錄之：

迺鶴壽校《蛾術編》五十八注云：「『胡為乎泥中』云云，似晉人氣習。且鄭公厚德，安有曳婢泥中之事？小說家欲以矜鄭，是以誣鄭耳。」嘉錫案：此事別無證據，難以斷其有無。特《世說》雜采群書，不皆實錄，迺氏之言，意有可取，存以備考。丁晏《鄭君年譜》云：「若夫義慶之說，婢曳泥而知書；樂天之詩，牛觸牆而成字。小說傳會，亦無取焉。」馬元調本《白氏長慶集》二十六〈雙鸚鵡詩〉云：「『鄭牛識字吾常歎，丁鶴能歌爾亦知。』自注引諺云：『鄭玄家牛觸牆成八字。』」嘉錫案：康成蓋代大儒，盛名遠播，流傳逸事，遂近街談。不惟婢解讀書，乃至牛亦識字。然白傳之引鄙諺，雖有類於《齊諧》；而臨川之著新書，實不同於燕說。且子政童奴，皆吟《左氏》（見《論衡·案書篇》）；劉琰侍婢，悉誦《靈光》（見《蜀志》）。斯固古人所常有，安見鄭氏之必無？既不能懸斷其子虛，亦何妨姑留為佳話。丁氏必斥其傳會，所謂「固哉高叟之為詩也」！<sup>36</sup>

「胡為乎泥中？」為《邶風·式微》詩句。《毛傳》：「泥中，衛邑也。」《毛詩序》：「〈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鄭箋》：「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于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鄭玄將「泥中」解釋為衛邑名，其家婢則根據實情，解之為「泥地中」。「薄言往愬，逢彼之怒」為《邶風·柏舟》詩句，《毛詩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鄭箋》：「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鄭玄家婢把此詩句引申之，埋怨鄭玄不聽其陳說，反使人曳

<sup>35</sup> 同註 33，頁 1653。

<sup>36</sup>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 193-194。

著泥中。上引余嘉錫《箋疏》重點在此事之有無，余氏按語以為此事或不能斷其為子虛，何妨姑留為佳話。鄭玄家奴婢此二個普通讀者，竟造成如此波瀾。張祝平〈鄭家《詩》婢自流芳——《詩》婢現象及其文化影響〉一文，可視為一篇「鄭家《詩》婢」接受史的研究。張文指出，《詩》婢現象有各色解讀，或為文人雅士高雅生活的象徵，或見鄭玄的道學和風雅，或為瓊瑋琳琅婦人文學之一葩，或借《詩》婢現象大發人生寄慨，或言詩婢之附庸流派難能創新的引申。《詩》婢模式對小說、戲曲的人物類型形象塑造亦有影響，在一些筆記小說中常出現鄭家詩婢類的人物，一些才子佳人、賣弄學問的戲曲、白話小說中也塑造了詩婢類人物類型，而《紅樓夢》中的香菱則是詩婢的詩化與昇華。<sup>37</sup> 這兩個不知名的普通讀者捲起了千堆雪，因他們而有的「鄭家《詩》婢」接受史，包涵效果史、闡釋史、影響史，真是歎為觀止。由余嘉錫的評論適足以說明「普通讀者」鄭家詩婢的影響力。

《世說新語·文學 52》云：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過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出自《小雅·采薇》，選用楊柳和雨雪兩種象徵季節的意象，寫出征時是楊柳依依的春日，今輾轉行役，回家時路途艱辛是雨雪霏霏的冬日。「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出自《大雅·抑》。《毛傳》：「訏，大。謨，謀。猷，道。辰，時也。」《鄭箋》：「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也。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孔疏》：「施教之法，當豫大計謀，定其教命，為長遠之道，而以時節告民，施之王之朝廷。」<sup>38</sup> 張立兵說：「謝安、謝玄對兩詩的態度，緣於兩人不同的審美期待視野。謝玄出身名門，青年才少，受到文學自覺的時代新風的影響，按照『詩賦欲麗』、『緣情綺靡』的標準，更激賞『楊柳』句情景交融的藝術美；而謝安人過中年，身為宰相，又處在前秦不斷侵擾東晉的特殊時期，國家的治亂是他最關心的，故《詩》中古人以為國家制定謀略大計為己任的深刻意蘊使他產生強烈的共鳴。」<sup>39</sup> 「期待視野」是姚斯在卡爾·波普爾（Karl R. Popper）科學哲學概念的基礎上，吸收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前理解」與伽達默爾「合法的偏見」的歷史性與生產性提出的，指的是讀者本身的期待系統可能會賦予作品的思維定向。<sup>40</sup> 讀者的期待視野與他的

<sup>37</sup> 張祝平：〈鄭家《詩》婢自流芳——《詩》婢現象及其文化影響〉，「第七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6年8月4日至7日），四川南充：西華師範大學承辦。

<sup>38</sup> 同註 33，頁 1367。

<sup>39</sup> 同註 29，頁 21。

<sup>40</sup> 王麗麗：〈文學史：一個尚未完成的課題——姚斯的文學史哲學重估〉，《北京大學學報（哲學

身分、經驗、年齡、知識、背景、審美品味、嗜好、興趣等等有關，上述謝安、謝玄的《詩經》接受，恰足以說明。陳文忠對此則的看法，著眼它一千多年的接受史，他說：

《詩經·小雅·采薇》末章：「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初為謝玄標舉，此後為歷代評家賞識；而從劉勰《文心雕龍》到劉熙載《藝概》的賞析闡釋，對古典詩學中作為核心論題的「情景」理論，作了淋漓盡致的發揮。《文心·物色》視其為「寫氣圖貌」的典則；皎然《詩式》借以肯定詩中「麗句」的價值；《宋景文筆記》所謂「寫物態，慰人情也」，進而揭示了借物寫情，情物交融的詩學原理；至王夫之《薑齋詩話》的「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則由情景同一，互藏其它的常態意境原則，進而提出了情景反襯、倍增其情的異態意境理論；再至劉熙載《藝概》的「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若捨景不言，不過曰春往冬來耳，有何意味」。此語看似尋常，實質從一新的角度強調了詩歌創作需以具象景物表現抽象情思的道理，具有更高的理論概括性，與艾略特的「客觀對應物」或「事物對當」之說相與契合。可以說，〈采薇〉自六朝、經唐宋至明清的一千多年接受史，正是傳統「情景」觀念的深化發展史。<sup>41</sup>

謝玄是一普通讀者，他對《詩經》詩句的摘句鑑賞，竟能導致後代理想讀者（詩評家）對情景範疇的討論。約翰生博士說：「能與普通讀者意見不謀而合，在我是高興的事；因為，在評定詩歌榮譽的權力時，在高雅的敏感和學術之後，最終說來應該根據那未受文學偏見污損的普通讀者的常識。」普通讀者的鑑賞寓有批評理論的潛質，約翰生這段話正可用來比況這一千多年的〈采薇〉接受史。

另外，《晉書·列女傳》載，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看來謝氏叔侄頗喜對《詩經》的摘句鑑賞。

《世說新語·賞譽 20》云：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嚴仲弼，九臯之鶴鳴，空谷之白駒；……。」

《小雅·鶴鳴》有「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及「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之句。《小雅·白駒》有「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之句。秀才，劉孝標本注以為是蔡洪，此則蔡洪化用《詩經》詩句，品評嚴仲弼。就字面義而言，此二詩句與隱逸有關。

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頁57。

<sup>41</sup> 同註18，頁313-314。

《世說新語·傷逝 17》云：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棖柩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

〈黍離〉是《王風》篇名。《毛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黍離〉之哀，故國之思，流離政權及人士所共有。劉孝標本注引《中興書》：「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嘆。」得其旨也。

《世說新語·賢媛 29》云：

郗嘉賓喪，婦弟欲迎姊還，姊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

《王風·大車》有「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之句，陳子展《詩三百解題》云：「大車，當是楚滅息後，一位息夫人殉夫殉國自殺而死的絕命詞。」<sup>42</sup>原詩很像寡婦的絕命詞或誓守貞節不改嫁之詞，郗嘉賓妻化用《詩經》詩句，表明自己不因夫喪而還歸，誓言守節。

《世說新語·排調 36》云：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唐風·葛生》有「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之句，陳子展以為「這可視為最古的一篇夫婦之間悼亡的詩。」何楷《毛詩世本古義》亦引《世說》此則，並云：「袁以死嘲劉，故主不平耳。則其為悼亡之詩舊矣。」<sup>43</sup>梅家玲以模擬嘲諷分析此則，在為了滑稽嘲弄的前提下，故意改變成辭字面，將其原本具有的嚴肅性質與正面意義，轉導向輕鬆詼諧的一面。亦即「在於刻意使用或模仿嚴肅事物或文體，藉形式與內容之不調和而產生滑稽悅人的效果。」<sup>44</sup>在這裡，由於略去「予美亡此，誰與獨旦」，並加上「文茵」與「長筵」二詞，故而「角枕」和「錦衾」的意象便不再孤立，反而增添了華美旖旎的情趣，以之來稱頌劉恢和公主的恩愛，乍看似乎頗為貼切。可是事實上，「角枕」一詩原本是悼亡之作，重點全在「誰與獨旦」中的「獨」字，用這樣一種

<sup>42</sup> 陳子展：《詩三百解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64。

<sup>43</sup> 同前註，頁449-450。

<sup>44</sup> 參見 Jone D. Jump 著、胡聲朴譯：《模擬嘲諷》第一章〈定義〉，收入顏元叔主編：《西洋文學術語叢刊》（臺北：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78年），頁525。

帶有濃厚感傷意味的典故來作反面文章，詼諧、嘲弄之意，實呼之欲出。<sup>45</sup>袁羊以死嘲帝婿劉恢，難怪公主要不平了，上引模擬嘲諷的定義，所謂「產生滑稽悅人的效果」，就公主來看，恐怕是憤怒、責備吧。「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袁羊的嘲諷是過頭了。

《世說新語·排調 41》云：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為讎？」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劉孝標本注：「《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荊蠻，荊之蠻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孫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詩經·小雅·采芑》有「蠢爾蠻荊，大邦為讎」之句。《詩經·小雅·六月》有「薄伐獫狁，至于太原」之句。此則梅家玲以「雙關」分析之。「雙關」是指用同一語詞同時關顧到兩種不同事物或景況的修辭方式。任何「成辭」都由個別的文字所構成，而每一文字又都各由形、音、義三項因素共同組成。在一句成辭之中，個別文字的「形」與「音」都必然是固定不變的；然而它的字義，卻極可能會在引用者有意導引之下，造成相當程度的轉移改易。其中，尤以就「稱代詞」的指稱對象，進行「偷天換日」的情況最多。習、孫二人的應對情形也應用了同樣原理：蠻荊、獫狁原皆為周時文化水準低落的蠻貊之邦，此刻成為二人調侃對方的代稱（「蠻荊」指習，「獫狁」指孫。）「大邦」原指周室，興公乃以之自謂，都是偷天換日手法的巧妙運用。<sup>46</sup>習、孫二人本不相識，在桓公坐，竟能以彼此的地望引《詩經》詩句互相嘲笑對方，《小雅》中也正好有彼此需要的句子，語言機鋒雖頗精采，但魏晉人此種戲謔之習，亦令人稱奇，所最可奇者，他們雜引各書嘲謔，就是儒家經典也不放過，儒經在此時期可謂從聖壇上走了下來，變成日常生活戲謔的資料了。他們有時也會以家諱，引經據典，嘲弄他人，此等後人不靠專家考證箋疏看不懂的事，在魏晉人卻優遊為之，這真是一個特別的時代。

#### 四、結論

德國文論家岡特·格里姆（Gunter Grimm）在〈接受美學概論〉一文中這樣概括走向接受美學之路：「倘若一條道路是通過對讀者產生的效果而從文學社會學到接受學研究的，那麼另一條道路則是通過解釋學，在文學學領域裡則專指通過對藝術作品的理解（確切說是解釋），而到接受學研究。」<sup>47</sup>「通向接受學研究的第三條道路開始自文學史」<sup>47</sup>「通

<sup>45</sup> 梅家玲：《世說新語的語言與敘事》（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頁148-149。

<sup>46</sup> 同前註，頁139-140。

<sup>47</sup> 岡特·格里姆：〈接受美學概論〉，見《接受美學譯文集》，劉小楓選編，（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頁85-86。

過對讀者產生的效果」就是效果史，「通過對藝術作品的理解和解釋」就是闡釋史，而接受學的文學史是作品與讀者視野不斷融合的過程史。卡爾·科賽克(Karl Kosik)說：「只要作品產生影響，作品就活著。包括在一部作品的影響之內的是那些既在作品自身中也在作品的消費中所完成的東西。」<sup>48</sup>科賽克給予姚斯以重要的啟示：文學作品的歷史可以體現為作品的影響；影響既發生在作品的審美層次(作品自身中完成的東西)，也發生在作品的消費層次，後者順理成章的呼喚出消費的主體——讀者；作品存在的理由即要求讀者對作品作出解釋，並經由讀者的閱讀解釋發生作用。<sup>49</sup>這種影響包括普通讀者的效果史，理想讀者的闡釋史，以及作家經由閱讀之後提出的創造。

本文論述魏晉南北朝普通讀者的《詩經》接受概況，發現有時普通讀者也會居於一代一代的接受鏈條中的重要地位，如謝玄對「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的接受，後來竟變成一千多年來詩評家們對「情景」觀念討論的發端。「鄭家《詩》婢」變成了一條綿長接受史的源頭，被用作詩人創作時的典實，也被筆記小說、戲曲、白話小說人物類型形象塑造所模仿。「鄭家《詩》婢」以普通讀者的身份走進了創作家的作品世界中。

魏晉南北朝普通讀者的《詩經》接受，也受到此時期戲謔風氣的影響，如袁羊諷劉恢、習鑿齒與孫興公互諷。在言談中顯現言語機鋒也時有所見，如邊文禮之答袁奉高、簡文與桓宣武入朝互讓、張天錫之答嫉己者。

魏晉南北朝普通讀者的《詩經》接受，也有摘句鑑賞的現象，這和詩評家如鍾嶸《詩品》的摘句批評，詩人曹操〈短歌行〉的照引《詩》句的形式是一樣的。喜歡問人《毛詩》何句最佳這樣的現象，未嘗不可視作摘句批評的萌芽與雛形。

有些普通讀者引〈黍離〉以寄故國之思，引〈北門〉以嘆家貧，化用〈大車〉以表堅貞，引〈鶴鳴〉和〈白駒〉以品評人物，也有八歲小童引〈泮水〉之句以顯夙慧。

本文因設定以普通讀者為論述中心，因此得其事例不多，若再擴充到理想讀者的智珠巧慧，將更繽紛多彩。魏晉南北朝的《詩經》接受像一部管弦樂譜，在其演奏中不斷獲得讀者新的反響，接受之鏈一代又一代地被充實和豐富。<sup>50</sup>

《詩經》學研究有廣狹二義，普通讀者的《詩經》效果史可納入廣義的《詩經》學研究。本文藉用「普通讀者」概念詮釋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以《世說新語》為範圍的考察，自認有助擴大《詩經》學的研究領域。「普通讀者」的聲音是微弱的，似乎難登大雅之堂，但他們並非不存在，本文讓他們透顯出「曾經存在過」的微弱亮光。重視《詩經》的「消費」研究，才是完整的《詩經》學。經典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已漸漸由聖壇走向民間，關注「普通讀者」的《詩經》接受，在《詩經》學史中應有一席之地。

<sup>48</sup> 引自胡經之、張首映主編：《西方二十世紀文論選》(第三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頁147。

<sup>49</sup> 同註40，頁56。

<sup>50</sup> 請參考前文姚斯之語。(本文第二節引言)。

(表二)《世說新語》運用《詩經》一覽表

編號	《世說新語》文句	《詩經》出處	說明
1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作色。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言語 1》)	《齊風·東方未明》：「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邊文禮與袁奉高均為普通讀者，此則屬於效果史。論述見正文。
2	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讎，以為至公；公旦，文王之子，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言語 7》)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上冊)修訂本云：《大雅·文王之什》、〈文王〉、〈大明〉、〈緜〉、〈棫樸〉、〈思矣〉、〈皇矣〉、〈靈臺〉皆頌文王之德。〈下武〉、〈文王有聲〉，頌武王能繼文王之業。《釋文》：「〈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是武王之《大雅》。」	此則荀慈明論及《大雅》中頌文武之德者，為周公旦之作，涉及詩篇的作者問題，屬於闡釋史。
3	禰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為〈漁陽參搥〉，淵淵有金石聲，四座為之改容。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慙而赦之。(《言語 8》)	《小雅·采芑》：「伐鼓淵淵。」《毛傳》：淵淵，鼓聲。	此則為《世說》作者引用《詩經》成詞以述鼓聲，屬於影響史。
4 5	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陛下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言語 13》)	《小雅·蓼莪》：「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劉孝標注云：「〈秦詩〉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	此則引《小雅·蓼莪》詩句，以明孝思，又引《秦風·渭陽》「我見舅氏，如母存焉」之意，以言命名之由，可視為效果史。

		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6	溫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言語 36》）	《王風·黍離》：「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凡三章，嘆亡國之痛。	此則《世說》作者引〈黍離〉篇名，以述亡國之痛，屬於影響史。
7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第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言語 49》）	《魯頌·泮水》：「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此則為效果史，論述見正文。
8 9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言語 56》）	《衛風·伯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魯頌·泮水》：「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此則二引《詩》句，屬於效果史，論述見正文。
10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陵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言語 74》）	《鄭風·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此則屬於效果史。
11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嘆，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言語 80》）	〈北門〉乃《詩經·邶風》之詩篇，《毛詩序》：「〈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此則屬於效果史，論述見正文。
12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	《小雅·頍弁》：「如彼雨雪，先集維霰。」	此則化用《詩》句，屬於影響史。

	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自皓然。」（《言語 93》）		
13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苻堅所禽，用為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己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淳酪養性，人無嫉心。」（《言語 94》）	《魯頌·泮水》：「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	此則化用《詩》句，屬於效果史，論述見正文。
14 15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文學 3》）	「胡為乎泥中？」為《邶風·式微》詩句。「薄言往愬，逢彼之怒。」為《邶風·柏舟》詩句。	此則二引《詩》句，屬於效果史，論述見正文。
16 17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文學 52》）	《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大雅·抑》：「訏謨定命，遠猷辰告。」	此則二引《詩》句，屬於效果史，論述見正文。
18	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風詩》。（《文學 71》）	劉孝標注引《湛集》載其《敘》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	此則談及補亡詩與仿作之事，屬於影響史。

19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賞譽 19》）	《大雅·卷阿》：「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萋萋，離離喈喈。」	張華詩於鍾嶸《詩品》列中品，此則化用《詩》句，屬影響史，蓋以此品評人物，此為魏晉南北朝所常見。
20 21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賞譽 20》）	《小雅·鶴鳴》有「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及「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之句。《小雅·白駒》有「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之句。	秀才，劉孝標本注以為是蔡洪，蔡洪此則化用《詩》句，品評嚴仲弼，屬於效果史。
22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賞譽 117》）	《大雅·文王》：「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阿源，殷浩也。此則借用《詩經》語詞品評人物，屬於效果史。
23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誠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而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規箴 6》）	《小雅·隰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何晏詩於鍾嶸《詩品》列中品，此則直接引用《詩》句，屬於影響史。
24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為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慙而止。	《召南·甘棠》有：「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之句，共三章，疊詠體，文字略同。	謝混詩於鍾嶸《詩品》列中品，此則化用〈甘棠〉詩意，屬於影響史。

25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容止 26》）	《衛風·碩人》：「膚如凝脂。」	王右軍為書法家，此則引用《詩》中語詞品評人物容止，屬於影響史。
26	有人嘆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容止 39》）	《大雅·崧高》：「鈎膺濯濯。」《毛傳》：「濯濯，光明也。」此文「濯濯」蓋光潔貌。	此則「有人」不知何指，難以判斷其身分。此蓋魏晉南北朝人品評人物之風習也。
27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榱桷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傷逝 17》）	見編號 6。	此則為效果史，論述見正文。
28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棲逸 12》）	《大雅·民勞》：「式遏寇虐。」朱《注》：「式，用也；遏，止也；寇虐，大惡也。言止絕不為害民之事也。」（引自楊勇《世說新語校箋》）	此則《世說》作者運用《詩經》語詞陳述戴安道之兄的志向，屬於影響史。
29	……。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賢媛 18》）	《大雅·瞻卬》：「邦國殄瘁。」《毛傳》：殄，瘁病也。	絡秀為李伯宗女，此則絡秀運用《詩經》語詞以言門戶瘁病，屬於效果史。
30	郗嘉賓喪，婦弟欲迎姊還，姊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賢媛 29》）	《王風·大車》有「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之句	此則為效果史，論述見正文。
31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母亡安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術解 7》）	《小雅·蓼莪》：「南山烈烈」，胡承珙《毛詩後箋》：「烈烈，山之高峻險阻」。	郭璞，字景純，列鍾嶸《詩品》中品，此則運用《詩經》語詞創作，屬於影響史。

32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任誕 3》）	《小雅·節南山》：「憂心如醒。」《毛傳》：「病酒曰醒」。	劉伶為竹林七賢之一，此則運用《詩經》語詞創作，屬於影響史。
33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群？」帝復問會：「臯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排調 2》）	《邶風·谷風》：「行道遲遲。」《毛傳》：「遲遲，舒行貌。」	劉孝標本注：「二陳，騫與泰也。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騫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群，祖父寔，故以此酬之。」魏晉人喜以他人父祖名諱相嘲諷，此為一例。此則為效果史。
34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瑠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答曰：「此盃英英，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排調 14》）	《小雅·白華》：「英英白雲。」《毛傳》：「英英，白雲貌。」	王公以此戲伯仁之無能，伯仁運用《詩經》語詞為自己辯護，屬於效果史。
35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排調 26》）	吳金華：《世說新語考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瞻送，郊原送別謂之『瞻送』，《晉書·卷七四·桓沖傳》：『男女老幼，皆臨江瞻送』《詩經·邶風·燕燕》：『遠送于野，瞻望弗及。』瞻送連文，取義於此。」	此則《世說》作者化用《詩經》詩句，屬於影響史。

36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稚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排調》33）	《小雅·楚茨》：「我黍與與，我稷翼翼。」《鄭箋》：黍與與，稷翼翼，蕃廡貌。	庾園客為庾翼子，故孫齊莊言「得重喚奴父名。」魏晉人喜以他人父祖名諱相譏嘲，以逞機智，此又為一例。此則孫齊莊運用《詩經》語詞，反唇相譏，似乎佔了上風，屬於效果史。
37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排調》36）	《唐風·葛生》有「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且。」之句。	袁羊不列鍾嶸《詩品》，故此則歸為效果史。論述見正文。
38 39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蠡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讎？」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排調》41）	《小雅·采芣》：有「蠡爾蠻荆，大邦為讎」之句。《小雅·六月》有「薄伐獫狁，至于太原」之句。	此則二引《詩》句，論述見正文。孫興公即孫綽，列鍾嶸《詩品》下品。習鑿齒未入《詩品》。姑列此則為效果史。
40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後。」（《排調》46）	《小雅·大東》：有「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之句。《說文》：「簸，揚米去糠（糠）也。」	此則化用《詩經》語詞，以逞機智，屬於效果史。
41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排調》58）	《秦風·小戎》有「在其版屋，亂我心曲」之句。	此則運用《詩經》語詞，屬於影響史。

42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排調》64）	《大雅·抑》：有「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之句。《孔疏》引孫炎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意謂在屋內隱蔽之處，還是有日光從天窗入。	此則「屋漏」一詞雙關。屬於效果史。
43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言次，及劉真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迴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輕詆》17）	《大雅·瞻卬》有「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之句。	此則直接引《詩》句。
44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床下蟻動，謂是牛鬪。孝武不知是殷父，問仲堪：「有一般，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紕漏6》）	《大雅·桑柔》有「人亦有言，進退唯谷」之句。	此則為效果史。



## 引用書目

### 一、書籍部分

- 〔唐〕孔穎達：《毛詩正義》，臺北：台灣古籍出版公司，2001年10月初版。
- 〔唐〕李延壽：《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3月初版。
- 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9月台景印初版。
- 李威熊：《中國經學發展史論（上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
-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 林登順：《魏晉南北朝儒學流變之省察》，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4月初版。
- 林葉連：《中國歷代詩經學》，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93年3月初版。
- 胡經之、張首映主編：《西方二十世紀文論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5月。
- 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9月臺六版。
- 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增注本）》，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
- 陳子展：《詩三百解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 陳文忠：《文學美學與接受史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
- 梅家玲：《世說新語的語言與敘事》，臺北：里仁書局，2004年7月初版。
- 黃偉倫：《魏晉文學自覺論題新探》，臺北：台灣學生書局，2006年7月初版。
- 楊 勇：《世說新語校箋（上冊）修訂本》，臺北：正文書局，2000年5月20日第一版。
- 劉小楓編：《接受美學譯文集》，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1月。
- 劉毓慶：《歷代詩經著述考（先秦—元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5月第1版。
- 魯 迅：《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二刷。
- 鄭士元：《中國學術思想史》，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台二版。
- 顏元叔編：《西洋文學術語叢刊》，臺北：黎明文化出版社公司，1978年。
- 〔日〕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臺北：廣文書局，1979年5月初版。
- 〔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著、周寧、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
- 〔美〕哈羅德·布魯姆著、徐文博譯：《影響的焦慮》，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
- 〔英〕維吉妮亞·吳爾夫著、劉炳善等譯：《普通讀者》，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7月。
- 〔日〕岡村繁著、陸曉光譯：《漢魏六朝의思想和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8月。

## 二、單篇論文部分

- 王麗麗：〈文學史：一個尚未完成的課題——姚斯的文學史哲學重估〉，《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
- 范子燁：〈「小說書袋子」：《世說新語》的用典藝術〉，《求是學刊》1998年第5期。
- 張立兵：〈《詩》「經」的解構與文學的張揚——試論《世說新語》引《詩》的特點及其產生原因〉，《社會科學家》總第124期，2007年3月。
- 張祝平：〈鄭家《詩》婢自流芳——《詩》婢現象及其文化影響〉，「第七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6年8月4日至7日，四川南充：西華師範大學承辦。
- 張啟成：〈論魏晉南北朝詩學觀的新突破〉，《貴州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
- 鄒然：〈六朝《詩》說攬勝〉，《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3卷第1期，2000年2月。
- 魯瑞菁：〈王逸《楚辭章句》引《詩》考論〉，第二屆全國經學學術研討會論文，2008年11月15日，高雄市：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主辦。
- 蕭希鳳：〈論《世說新語》對《詩經》的引用〉，《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第29卷第5期，2008年5月。

